
中国当代图书馆
馆 长 文 库

陈 力 著

归来拂尘集

陈力自选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中国当代图书馆
馆长文库

归来拂尘集

陈力自选集

陈力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来拂尘集: 陈力自选集 / 陈力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

(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

ISBN 978-7-5439-7138-7

I. ① 归… II. ① 陈… III. ① 图书馆工作—文集 IV.
① G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955 号

责任编辑: 胡欣轩

装帧设计: 许 菲

丛书名: 中国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

书 名: 归来拂尘集——陈力自选集

陈 力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14 00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138-7

定 价: 88.00 元

<http://www.sstlp.com>

目 录

文史论集

- 3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起源新论
- 29 王国维先生《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略述
- 47 20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 71 今本《竹书纪年》研究
- 99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
- 116 《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
- 127 《红楼梦》东观阁本再考
- 149 西晋灭吴时日考异并中华版《晋书》校勘体例商兑
- 156 书为媒：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 166 徐中舒先生与夏文化研究
- 180 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史与野史
- 200 晋国成文法的形成试探
- 214 七十年关于井田制的讨论及评议

- 225 井田制与农村公社所有制辨异
- 242 西周时代的分封制与贵族的土地等级占有制
- 276 西周土地制度考辨
- 288 汉族民间巫术与中国传统医学

图书馆学论集

- 323 公共服务中的图书馆服务
- 345 转型中的公共图书馆及其服务
- 359 纸本期刊与电子期刊：国家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二难选择
- 373 论数字图书馆的多元化资源建设
- 387 “开放存取”刍论
- 405 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
- 418 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再思考

微言集

- 439 关于加快文化领域立法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2008年）

- 444 关于进一步加大和完善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事业支持力度和管理办法的建议（2008年）
- 447 关于启动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第二期计划的建议案（2008年）
- 449 关于增加古籍保护经费投入，建设国家级古籍保护修复中心的建议案（2008年）
- 452 关于中央级公益类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经费预算单列的提案（2008年）
- 454 关于加快《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的建议（2009年）
- 456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图书馆建设的提案（2009年）
- 458 关于尽快建立志愿服务保障机制的提案（2009年）
- 460 关于设立“海外中华善本回归工程”的提案（2009年）
- 462 关于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的建议（2010年）
- 465 关于完善我国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议（2010年）
- 468 关于制订《全民阅读促进法》的建议（2010年）
- 470 建立和完善版权代理机制，促进作品的有效利用（2010年）
- 473 完善相关立法，促进“孤儿作品”的有效利用（2010年）
- 476 关于开展国家图书馆专项立法工作的建议（2011年）

- 479 关于落实“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的建议（2011年）
- 481 关于制定《出版物样本缴送管理条例》的建议（2011年）
- 485 关于重视残疾人信息获取和公共文化服务无障碍工作的建议（2011年）
- 487 关于检查“三馆免费开放”落实情况的建议（2012年）
- 489 关于立即停止“中小学校并校”并就此进行全面评估的建议（2012年）
- 492 关于加快《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进程的建议（2013年）
- 494 关于重视和加强互联网信息长期保存工作的建议（2013年、2014年）
- 497 关于加强出版物呈缴立法的建议（2014年）
- 500 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统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建议（2014年）
- 504 关于在《公共图书馆法》中增加“总分馆制”内容的建议（2014年）
- 507 关于加快建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的建议（2015年）
- 510 关于建立国家文献战略储备体系的建议（2015年）

- 513 关于将农家书屋纳入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议
(2015年)
- 516 关于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议(2015年)
- 520 推进“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2015年)
- 522 统筹协调、制度创新 促进公共文化资源有效利用(2015年)

其他

- 529 文化惠民要实惠
- 533 任继愈先生琐忆
- 541 “文化自觉”与“文化强国”
- 548 当代乡村文化之忧与思
- 558 基础教育与儿童阅读
- 563 文化惠民,重点是“实”惠
- 566 滇越铁路存废之我见
- 570 说书序
- 573 后 记

文史论集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起源新论*

印刷术是一种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文献内容进行复制的技术，它能够大量、经济地复制文献内容，从而使其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种新的图书复制技术的发明，而更在于其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美国学者卡特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人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美洲，因而使全世界、而不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种以及其他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1]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2]因此，在现代几乎所有研究中

*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2期。

国图书史的著作中，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1 雕版印刷起源探因

谈到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学者大多归之于刻石捶拓技术和玺印原理的启发。

中国的刻石起源很早，初唐时在今陕西凤翔发现十个石鼓，上刻有文字，为春秋时期秦国的石刻，也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到了东汉，人们开始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之上，作为士子学习的范本。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大量的佛经与道经的刻石。伴随着刻石，捶拓技术也发展起来了。捶拓技术起源于何时，现已不得其详，但根据现有的史料，至迟到南北朝时，这项技术就已被普遍采用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唐初秘府尚存北齐以前石经拓本。

用捶拓的方法可以进行文献的批量复制，但是，一则刻石不易，二则捶拓技术也较复杂，三则刻石的字体都较大，如是篇幅较长的文献，刊刻捶拓都更加困难，再加上拓片的裱糊、收藏和展阅也都很麻烦，所以不可能用捶拓技术来进行普遍性的、大规模的文献复制。古人除了直接从碑石上捶拓，也用枣、梨等硬质木板仿刻前代一些著名的碑刻，然后再从其上捶拓，唐杜甫诗云：“峯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3] 后世许多“法帖”

* 参见：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此类研究成果很多，不俱录。

就是用此方法翻刻拓印的。用枣木翻刻古代名碑与用枣木雕印书籍，虽有阴文、阳文之异^{*}，但其原理毕竟是相同的。因此，将雕版印刷的产生与捶拓技术的发明联系起来自有一定道理。

由于捶拓的对象为正字书写，与雕版印刷术的反字书写然后刷印出正字的印本尚有一定的区别，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的玺印就提供了另一种启示。

玺印在中国出现很早，到战国时，它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玺印是将反体的文字刻在金属或石、木质块上，然后沾上印泥盖在纸上（最早是封泥），这样文字便印在纸上了。玺印的原理与后来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术完全一样。清人李元复曾说：“书籍自雕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籍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4]美国学者卡特亦谓：“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木刻中间的过渡型态。”^[5]

东晋葛洪（公元284—364年）说，道士入山，为了避免虎狼及鬼魅的侵害，要带上一种有一百二十字的黄神越章之印^[6]，这种印是盖在封泥之上的。一个黄神越章可以盖无数个护身的灵符，如果盖在纸上，那就是一件小小的印刷品了。向达先生指出：印刷术最先可能是由于需要大量复制佛、道教的画像及禁咒等而发明的^[7]。根据上面这些分析，捶拓与玺印技术与印刷技术有着非常相近的原理，当然有可能是印刷术的源头之一。

不过，所谓起于玺印，起于捶拓，仅仅是就技术原理的相似

* 王国维先生曾指出此乃阴识，非阳刻，是。王说见《观堂别集·晋开运刻毗沙门天王象跋》，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王国维遗书》本，1983年。

性而言，玺印早在先秦就已出现，为何那时没有用于复制图书？又，将雕版印刷技术起源与玺印、捶拓相联系，也只是局限于在纸质物品上的复制技术而言，如果我们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在先秦两汉时期，以纺织品为承印物的印刷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而这种技术从原理上说与雕版印刷技术是完全一样的，印刷的品质也完全不输于宋元以后的雕版印刷品。

中国古代纺织品很早就有了印花，至迟到西汉前期，凸版印染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凸版印染是用木板或其他材料雕刻成凸出的花纹，然后在纺织品上压印而成。1972年，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印花丝织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印花敷彩纱，一类是金银色印花纱。根据其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印花敷彩纱分析，该件织物通体图案由若干印花菱形单元联缀而成，“印花菱形单元图案的高约为40毫米，宽约为22毫米（花穗部分，嵌入下一单元之间的缝隙中，不计在内）。印花的图案由四个单元图案上下左右连接，构成印花分版的菱形网格。在织物上的印花单元图案纵横连续，错综排列，通幅有二十个单元图案分布。”^[8]在这些图案花纹中，没有发现墨渗和晕染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块面花纹，根据这些现象分析，它是用阳纹版（雕刻凸版）印制而成^[9]。在马王堆出土的丝织物中，还有三件金银色印花纱，“印花纹样的单元图案由三块纹板套印而成”^[10]。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两件铜质印花凸版，其中一件正面花纹近似松树形^[11]，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印花织品，其中一件印花织品的图案恰与花纹近似松树形的凸版相吻合^[12]。不少学者都指出，从印刷技术的原理上看，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

印花织品与文献的印刷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雕版印刷，只是前者是印刷在丝织品上，而后者是印刷在纸上。

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印刷织物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凸版，其印刷原理与图书印刷是完全一样的，其纹样精美、精细的程度，也完全不亚于文字刻印，可见，至迟到西汉初年，中国人就已熟练地掌握了版印原理与技术，只是那时更多地将其用于纺织品花样的印刷而已。到宋代时，这项技术仍然在广泛使用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

皇祐（公元1049—1054年）初元，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图成，复令传摹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13]

这里所提到的“镂版印染”，可能不是指简单的镂版印刷，而是指彩色套印，或者先版印后着色。宋代朱熹知台州时，控告前任唐仲友任用正在服刑的犯人、用公款雕刻《荀子》等四子书版，然后运回其在家乡开设的书铺印书出售，“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斕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綵帛铺，充染帛用”^[14]。所谓“花版”及其使用，原理与印书雕版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是在纸上，印的是文字；而另一个则是印在布帛上，印的是花纹。由此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早在汉初人们就已完全掌握了模印技术，但却未将其用于印刷图书？吾师徐中舒先生尝云：

盖中国雕刻当殷周之世，已极发达。其时遗物，如骨器铜器等，纹制精美，而甲骨文字及铜器铭文之刻铸，尤其铜范上反铸之字，与印刷之雕版，其形制几无差异。秦汉而后印刷用之纸张，既已发明于中国，而石刻碑碣，又日增月盛，汉魏石经，一再勒于太学，又与书有雕版何异？以如是宜于发生印刷之环境，历如是悠久之岁月，而印刷术犹不能立即发生。必待隋唐而后，石刻渐有毡拓，如今碑帖之打本，其与印刷相差只一间，以此为前导，而后印刷术乃继之而起。^[15]

显然，在图书印刷技术发明与应用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任何一种技术发明与应用，都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一是技术本身，包括原理和具体方法；二是制作的材料；三是功能，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四是能让这种技术得以应用的社会环境。原理与方法属于技术的层面，通常我们将其纳入技术发明的范畴；而功能，它应该是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如果仅仅是一项技术发明，但其成果不为人们所需要，便不会得到实际的应用。V·戈登·柴尔德教授指出：“任何一种技术，就像人的生活本身一样，包含着人的群体甚至社会成员之间常规的、经常的合作，群体的规模，社会公认的需求及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都对这种合作性群体的特征有深刻的影响。”^[16]当然，社会环境也十分重要，历史上曾有一些技术和发明，被当作奇技淫巧，不被人们所认同；还有一些技术，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距离太远因而无法得到应用和推广。只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广泛使用，一项技术发明才有意义。

印刷术的发明与印刷出版业的出现是有区别的。印刷术应用只是利用印刷技术进行文献的复制，有可能规模很大，也有可能只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应用，对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印刷出版业的出现是以社会化的需求为前提的，它需要相关产业如造纸、制墨、专业的雕版和刷印工匠以及发行、销售等等条件的支撑。作为一种产业，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还应当有相关的规则与管理制度。在中国古代，虽然印刷技术的原理早就被发现并应用于纺织品印染，且其精细、精美程度不输于图书印刷，但是，在很长时间，雕版印刷技术并未用于图书的复制，究其原因，当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而其直接原因，则与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教育、宗教发展进程有关，即文献大规模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尚未形成，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尚未有足够的需求驱动，也缺乏必要的市场环境。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在中国出现很早，但与欧洲中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隋唐以前，城市与农村基本上是一元结构，战国以后一直到隋唐，城市的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虽然有的城市的规模不小，如战国时代齐国都城临淄人口已达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17]，但其他地方的城市功能并不十分明显，有学者指出，中古以前，城市不过是有围墙的农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乡村自身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虽然自商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商业贸易，但商业活动基本上属于各地特产物资的贩运，专门为销售而生产和买卖的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充分。另一方面，春秋以前，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地主或者领主的依附关系十分强烈。战国以